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十九世纪历史学与 历史学家

下 册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十九世纪历史学与 历史学家

上册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 著

耿淡如 译

卢继祖 高健 校

谭英华 校注

商务印书馆

1989年·北京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

(全 两 册)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 著

耿淡如 译

卢继祖 高 健 校

谭英华 校注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062-9/K·11

---

1989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618 千

印数 2,500 册 印张 29 插页 8

定价: 12.65 元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十九世纪历史学与 历史学家

下 册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 著

耿 淡 如 译

卢继祖 高 健 校

谭英华 校注



商务印书馆

1989年·北京

---

## **HISTORY AND HISTORIANS**

###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y G.P.Gooch

First Published in 1913 by Longmans, Green and Company

First pulished as a Beacon Paperback in 1959 by

arrangement with Longmans, Green and Company

根据美国波士顿灯塔出版社 1959 年平装本译出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庸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86年先后分四辑印行了名著二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7年2月

---

# 中译本序言

## I

英国著名史学家古奇 (George Peabody Gooch, 1873—1968 年) 所著《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书, 是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 历久不衰的学术名著。早在 1910 年, 古奇为《剑桥近代史》第十二卷即末卷撰写了题为《历史科学的发展》一章(第二十六章)。尔后, 在此基础上, 续事增修, 撰成此书。这部著作于 1913 年初版问世后, 立即博得了欧美史学界的好评。美国史学家肖特韦尔 (J. T. Shotwell) 誉为“前所未有的鸿篇巨制”, “是对史学也是对文学的贡献”。<sup>①</sup> 欧洲史学名家如德国的迈尔 (E. Meyer), 英国的屈维廉 (G. M. Trevelyan) 对作者的渊博知识和所掌握的丰富文献深为折服, 给以很高的评价。<sup>②</sup> 古奇亦由此而声誉鹊起, 跻身世界第一流史学家的行列。50 年代, 作者对本书作了几次全面的补充、修订。新版仍然备受欢迎, 有人称之为是“对历史学作出的不朽贡献”。<sup>③</sup> 七十多年来, 这部著作不断重印, 并被译为西方多种文

① 《美国历史评论》, 1913 年 10 月号, 书评。

② 关于西方史学界对此书的重要评论, 参见 F. Eyck: 《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MacMillan, 1982) 第 219—223 页。

③ Fred. L. Hadsel: 《George Peabody Gooch (1873—1968)》, 载 S. W. Halperin 主编: 《Essays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The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70) 第 74 页。

字和日文,成了研究近代西方史学必不可少的基本读物。

《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不是一本为初学所编写的教科书,也非通俗读物,而是融会了作者对近代西方史学的心得体会,真知灼见的学术著作。全书涉及五百多位史学家,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头绪纷繁,范围辽阔。在编纂上,既非严格按照时代顺序,亦非完全依国别、地区进行分类,体裁多样,不拘一格。在叙事上,作者往往根据自己的见解来剪裁取舍,纵横驰骋,夹叙夹议,直抒胸臆,为一家之言。对一些史学上的重大事件,史学家的生平,有的略而不书,有的不具始末,使人难以一目了然,体会要领。为了方便阅读,现在先对此书主要内容作一简要介绍,然后进行评价。

全书初版二十七章,1952—1958年增加了介绍近数十年史学新成就的《导论:近时的历史研究》一章,共二十八章,除第一章《从文艺复兴到法国革命的史学》外,其余二十六章采取分国叙述与专题介绍相结合的方式,第二十一至二十七章全属专题范围,而分国之中亦有专题介绍。在二十六章之中,德国占七章半(第二至八章,第二十四章第一节),英国六章,法国五章,德国史学所占篇幅为全书四分之一强,居于首位。

德国部分是以兰克学派为中心,上下推溯,左右延衍来开展记述的。第二至五章从近代批判史学的先驱尼布尔和在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下,为拿破仑战争所激发的德意志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研究的发展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介绍了兰克史学的背景。作者认为尼布尔以其对早期罗马史料的考订和对罗马制度、阶级与风俗之起源的研究,“把处于从属地位的史学提高到一门庄严的独立科学”(第二章);尼布尔并且是最先重视历史研究与爱国主义教育之

联系的学者之一。浪漫主义史学最缺乏的是历史考证方法,批判史学恰恰弥补了这一缺陷。沃尔夫把语言学的方法应用于古史研究,提出史料必须通过内容和外形的验证的原则。博克搜集希腊铭文,用古代语言来考察希腊文明,为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方向。奥·缪勒第一次用神话学来恢复早期希腊罗马历史。格林的童话研究创立了关于条顿族起源的科学,他的语言研究则创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法,以上几人都有力地促进了德国的历史研究。对德国史学一度发生过影响的法理学的历史学派,把民族生活和国家历史,法律的兴革和民族生活联系起来,强调了历史的延续性和继承性。萌芽于反拿破仑斗争时期的《德意志史料集成》这一首创的巨型史料丛刊,不仅推动了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而且为以批判精神与考订方法整理史料树立了典范。

兰克第一次将尼布尔的原则用于研究近代历史,并在其《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中提出了后来成为“客观”、批判史学旗帜的口号——“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他的代表作《教皇史》,把教皇制度当作一种历史现象来考察,肯定它在中世纪作为欧洲文明的伟大统一因素的作用。此书以其态度“公正”,和批判地处理史料,赢得好评,并为这一学派史学树立了基础。古奇总结兰克在史学上的成就为:他尽最大可能地把研究过去同当代的感情区别开来,描写事情的实际情况;建立了论述历史必须严格依据同时代资料的原则;通过对权威性资料之分析、鉴别、订正,开创了考证的科学;阐明了欧洲的统一性,描绘了历史戏剧中的主要角色,使近代欧洲历史更加为人了解。对于兰克史学的缺失,也提出了评议,但认为那些缺失是消极的而非积极的。

兰克之所以蔚为一代宗师,除了他在学术上的吸引力外,还得力于长期举行学术讨论班,使其影响世代相传,并不断扩大;同时,他的学术地位也是经受了与他对立的学派和学者的抨击而成长起来的。第七章介绍了兰克的论敌利奥、罗特克、施洛塞尔与格维纳。在门人中介绍了恪遵师教继承衣钵的魏茨、吉泽布雷希特等人。

一反兰克学派的最高信条,公然声言要以史学为霍亨索伦王朝效劳的是“普鲁士学派”。达尔曼被称为这一学派的“精神之父”,而实际上使这个学派扬名世界,并影响了普鲁士政策的是德罗伊曾。背离了兰克学派的聚贝尔是这一学派的另一名主将。古奇称他是“使他们的同胞作好准备,迎接那完成于1870年的大转变起了很大作用”(第八章)的学派的领导人。这个学派的殿军特赖齐克的名字“代表了德国由邦联的瘫痪状态上升到1870年的光荣地位的过程”(第八章)。古奇对他们为政治目的而抛弃“客观、公正”原则的政治态度与方法进行了冷隽而严肃的批评。

以《蒙森和罗马史研究》为题的第二十四章高度赞扬了蒙森的史学成就,认为他对古意大利方言的研究是对历史学、人种学,以及前罗马时代意大利语言的划时代贡献。他的《罗马史》为近代世界提供了第一部关于罗马共和国的全面概述。蒙森不仅由于记述历史,而且由于解释制度,编纂铭刻和文献博得了声誉,与兰克并列19世纪第一流史学家。

关于法国史学的介绍,采用了划分学派和专题两种方式。以1789年大革命为起点,按时间顺序,首述“浪漫主义学派”。列举了夏多勃里昂、梯叶里、米什莱等五人。认为夏多勃里昂的《基督

教真髓》对于解放思想,扩大历史想象力,激发历史感起了重大作用。梯叶里的《诺曼人征服英国史》开创了一种新的、有力的编纂方法,是法国第一部高度文艺性的历史,但不同意其论点。说米什莱的著作把庄严雄壮、诗情画意同对人民的热爱结合起来,取得了艺术和历史的统一。他的书中只有一个主角,那就是人民;但由于心情太激动,感情太强烈,他对生活的看法不稳定,不全面,缺少精确性。第十章记述以基佐为首,包括米涅、梯也尔的“政治学派”。他们是以历史为武器,反对复辟王朝的战士,他们研究和编纂历史的目的是解释而非叙述,是教导而非描绘。他们既反对绝对专制,肯定大革命的必然性,又反对雅各宾主义,谴责恐怖政治及其引起的后果。

以下三章是有关法国中世纪和旧制度,大革命,拿破仑三个专题的史学。第一个专题着重介绍了古朗治在其《古代城邦》和《古代法国制度史》中所表述的罗马学派观点。作者认为入侵的法兰克人没有带来新事物,入侵不是征服,而是罗马化的日耳曼人的和平定居。本章还评述了古朗治在史学方法论上的主要观点。第十二章为法国革命专章,所收史学家按其对革命的态度,可分为基本肯定或否定,以及毁誉参半的三类。第八章介绍的聚贝尔《法国大革命时期史》即属于第二种类型。在本章中,古奇认为路易·勃朗《法国革命史》的价值,在于他第一个利用克罗克文献,为革命史研究开辟了一个丰富的资料来源,以及首先对旺代叛乱进行全面记述,成为后来研究者的先导。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出,革命是旧制度的合乎逻辑的延续,只是加速了它的发展趋势。革命的动力来源于争取平等,但为平等而牺牲了自由。泰纳的《现

代法国的起源》以其全面否定大革命而知名。作者认为自 1789 年以来,法国人所想的和所作的“一半像疯子,一半像儿童”(第十二章),大革命乃是一次瓦解,生命财产的保障已随中央政权的倾覆而荡然无存了。古奇对索勒尔的《欧洲与法国革命》评价甚高,指出作者支持 1789 年原则,但谴责恐怖统治;把企图颠覆祖国的逃亡者与逃避迫害的流亡者加以区别;认为对外作战是为了保卫边境,防止旧制度复辟,但作得过分了。奥拉尔的巨著《法国革命政治史》以大革命的人民主权与平等的原则为主题,指出君主政体不是由共和派而是由自己的阴谋推翻的,恐怖政策乃是出于抵御外侮和保卫革命成果的需要,1793 年的领导人拯救了法国。古奇认为他的最大贡献在于对革命文献的整理和编订。

在拿破仑研究方面,梯也尔的《执政府与帝国史》实为先驱。此书是形成拿破仑传说的主要来源之一,它给拿破仑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推动力(第十章)。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和普法战争使一些史学家对第二帝国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梯也尔是其中之一;泰纳从对混乱和专制主义的仇恨出发,把拿破仑写得一无是处,说他生非其时,生非其地,实际上是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雇佣兵队长。另一方面,拿破仑的崇拜者乌松,从家庭和妇女等侧面研究这位伟人,认为皇帝代表了革命的崇高与祖国的神圣。法国民族只有在对皇帝的信仰中才能获得慰藉,达到心目中的复兴。旺达尔研究拿破仑家族,断言雾月政变不是摧毁自由,而是恢复秩序与繁荣;拿破仑不是窃权者,而是人民痛苦的平息者,民族团结的恢复者。

在论述英国史学的六章中,自由主义的辉格派史学所占的比

---

重最大。哈兰是此派的第一个权威代言人。他的《英国宪政史》是第一部具有国内国际意义的英国近代史,开创了一代辉格派史学。作者认为英国自古以来存在着—部明确的宪法,是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破坏了宪法,但他谴责处死国王,他不满意共和国和护国政府,赞扬1688年革命。他的关于这一政变的评述成了辉格派政治理论的经典解释。继他而起的麦考莱早岁即以历史论文见称于时。古奇称其论文对17世纪18世纪的贡献不亚于莎士比亚戏剧对15世纪的贡献(第十四章,下同)。但也指出他知识面狭,具有偏见,文风粗放等缺点,说他“不过是一个通晓人情的,有文化的庸人”,他成功的秘诀在于文笔。称他的代表作《英国史》是对1688年革命及其发动者的一篇颂歌,也是“自吉本以来英国语言中最伟大的著作”,这部著作使麦考莱成为使人们对历史发生兴趣的第一位英国作家。第十五章介绍了辉格派第三位大史学家格罗脱及其名著《希腊史》,认为此书以雅典民主政治及人民主权观念为核心,虽有偏重雅典,忽视其他城邦和忽视经济因素等缺点,仍不失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之一”。

辉格党人用历史来论证政见,而卡莱尔则用它来进行道德说教。他的《法国革命史》既表述了作者的伦理宗教观念,同时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但作者误解了革命的性质。古奇指出,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中出现的成熟的价值学说影响和损害了他的后期著作。他的门生夫鲁德在《英国史》中发展了英雄崇拜观点,把亨利八世也当作了民族英雄。

在英国,用严密的方法进行历史考订,自牛津学派的魁首斯塔布斯始。他是引进德国史学方法用力最勤的人。他的《英国宪政

史》是关于英国民族生活的第一部权威性记述,是探索英国宪法问题的第一次尝试。他的教学、研究工作以及参加《卷帙丛书》编纂的模范行动,使牛津形成了系统研究史学的中心。弗里曼则是与斯塔布斯在政治和学术上大相径庭的这一学派的另一大师。他以历史的统一性为其史学观点的核心,认为从古希腊直至近代,欧洲的历史没有中断,这是一大贡献。被古奇列入牛津学派的格林,异军突起,以其《英国人民简史》而驰誉史坛。他不是人民史的首倡者,而是第一个用具体的历史来阐明这一观点的人。此书打破王朝体系,以各时代的主要特征来划分历史时期,对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给予同样的注意。作者同情人民的疾苦与理想,始终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此书的出版是“史学界划时代的大事”(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介绍加第纳、莱基、西莱与克莱顿,而以加第纳居首位。他第一次根据大量公私档案写成的一系列英国革命史巨著,“以同等深刻的见解,说明王党与议会各自的立场”,不同意辉格派史家对詹姆士一世的评价和对王朝专制、背叛国教的指摘,论证革命的爆发是由于个人统治已不能继续;对克伦威尔有赞扬也有谴责。他的著作被认为是19世纪后期英国史学界最坚实而持久的成就。对于莱基,古奇称许他的《十八世纪英国史》,认为其价值可与加第纳的著作媲美。西莱的代表作《英国的扩张》是第一部研究这一课题的专著,后来成了“英帝国主义的圣经”。

英国史学部分以阿克顿与麦特兰终篇,然而着力介绍的是前者。阿克顿是自由主义者,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自由思想与宗教信仰互相渗透,他宣扬宗教与科学的结合。阿克顿认为历史家的责任在于揭示自由的过程。他反对新教,也反对“教皇无谬论”

和“教皇极权主义”，肯定中世纪教会在同世俗权力斗争中使个人获得自由的作用。他谴责宗教改革导致了王权神授的理论与实践，歌颂法国大革命为人类解放所作的贡献，但认为其结果使议会专制取代了君主专制。阿克顿深受兰克史学方法的薰陶，强调研究工作的科学性，客观性；但又主张历史家不仅是事实的解释者，而且是伦理和公道的捍卫者，直到弥留之际他的关于历史的伦理观点才有所改变。

## II

古奇出生于伦敦商人家庭，受教育于剑桥大学，毕业后曾赴柏林、巴黎留学。回国后，投身政治活动，但未放弃学术工作。1898年以《十七世纪英国民主思想》一文获提华尔征文奖。他是一位学者而兼政治活动家，在政治上属自由党的温和派。1906, 1913年两度被选为下院议员。自1911年开始主编有名的自由主义月刊《当代评论》，历四十九年之久。1922—1925年当选为英国历史协会主席，1933—1936年任英国和平理事会主席，1935年牛津大学赠予荣誉博士学位。古奇在史学领域有广泛的兴趣和多方面的才能。除史学史外，于英国近代外交史、思想史，以及德、法、俄等国近代史多所涉猎，撰有大量专著，其所主编的《剑桥英国外交政策史1783—1919》，《有关大战起源的英国文献1898—1914》，选材精审，内容详瞻，富有史料价值，名重一时；但在他所有著作中最受史坛推重的是《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这部著作。

古奇毕生生活于英国社会的上层，是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培

育出来的学者。他在青年时代即服膺约翰·穆勒的哲学和政治历史学说。在柏林的进修,亲炙了兰克史学的流风余韵,对之深为向往。1896年结识了著名的自由思想家阿克顿,受其启发,他的上述获奖论文便是在后者的指点下写成的。阿克顿又是一位由德国史学训练成长的史学家,并且是在英国大力介绍这种史学的先驱者之一。他们的结交,加深了古奇对兰克史学的景慕。英国自由主义哲学与兰克史学方法,在尊重理性,不迷信权威,强调知识必须以经验为基础这些方面原有相通之处。古奇在长期的治学工作和政治生活中将二者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的史学体系:在政治历史观上,坚持温和的自由主义,在史学方法上,遵循兰克的道路。几十年来,不管英国和世界的形势如何风云变幻,他的史学体系没有重大变化。

典型的英国自由主义历史哲学的传统是,以个人和个人的自由意志为中心,强调个人自由(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至高无上地位;认为对于个人与社会国家的矛盾,可以调和、妥协,找出公私兼顾的中间道路。自由主义史学家坚信社会历史是一个不断的逐渐进步过程,个人、思想观念和偶然事件对历史发展能起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历史是可以认识和解释的,但社会历史运动没有什么类型或模式,没有什么必然性,对之不能作出概括和预定的结论。在历史研究和编纂中想象力和艺术表达具有重大意义,有的人甚至认为史学就是文学或艺术。兰克学派史学则以真实性、“客观性”为治史的最高准则,详尽地占有原始资料和对史料进行从外形到内容,从文字到作者的考核、鉴定,是编写历史的基本要求。他们认为研究和编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提供政治、道

德或宗教的教导,而是为了了解过去的真相。《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书便是在这样的思想和方法指导下写成的。

在本书初版序言中,作者揭示的写作宗旨是:“总结并估计近百年历史研究与著作的成就,溯述科学方法的发展,衡量那些导致撰写著名著作的政治、宗教与种族影响,以及分析它们对当时生活和思想上所产生的效果”。我们知道,历史乃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而作为意识形态的历史学又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sup>①</sup>的。要总结史学成就和衡量其社会背景与社会效果,就不能脱离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政治斗争形势和思想文化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与相互作用。古奇昧于此理,拒不承认历史现象中客观存在的、内在的联系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为历史哲学“是一项推测的工作”(第二十七章)“探索历史的目的及其规律(如果有这种规律的话)仍在继续中”(导论),现在“还不可能制定出足以满意地解释人类演化的规律”(第二十七章)。从全书的内容来看,他既反对唯心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也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而其矛头首先针对历史唯物主义。他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体系”,称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为“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名著”。在《导论》中,一则曰: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障碍已使公正无私的历史研究变为瘫痪”;再则曰:“在铁幕后,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历史研究继续处于瘫痪状态”。十分明显,他所非难的并非苏联的史学,而是历史唯物主义。本书只字不提马克思主义在促进西方史学发展上的影响,绝口不谈历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0页。